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

来新夏
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来新夏等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ISBN 7-208-03610-1

I. 中... II. 来... III. 图书馆事业-文化史-中国-1840~1949 IV. G25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9926 号

责任编辑 虞信棠

封面装帧 孙宝堂

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

来新夏 等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5 插页 5 字数 305,000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3610-1/K·863

定价 24.00 元

前 言

我自转攻“中国图书事业”方向以后,鉴于过去书史、目录学史和图书馆史三分天下,各成系统,以致难免有重叠歧出之处,深感有改革的必要,所以就有一种“三史合一”的设想,准备写一部《中国图书事业史》,合三史为一书,以便利教学与学习。但颇感兹事体大,甚难一蹴而就,于是决定先编写古代部分,由我根据八十年代前后自己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成果,撰写了一份四万余字的提纲,并以讲话形式先在《津图学刊》连载,征求意见。同时邀约一些朋友和学生参与合作,依据提纲,分头撰稿。经过三易其稿,四度修订,终于在1987年完成了一部30余万字的初稿,经我统一增删修订,勒成定稿,并承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列入“中国文化史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

在《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编写过程中,我就考虑着手进行近代部分的编写。当时曾按照中国近代史发展的线索,提出一个初步提纲,邀请几位朋友讨论;但因为这种写法很难着笔,而有关资料的搜集亦非一朝一夕之功,所以大家主张先从专题研究作起。我也想这样急就章,恐难保证质量,于是便暂时搁置起来。1985年后,我开始招收中国图书事业史方向的硕士生,在考虑如何安排他们的学习和研究时,产生了一个构想:我把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分成若干专题,在近十年过程中,由各个研究生认选专题,作为学位论文题目,按专题写成材料较充实、论述较完整的论文。1995年随着这一方向最后一个研究生的毕业,这项

工作圆满结束,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先后参加撰写专题和书稿的研究生有(按姓氏笔画为序):王立清、刘小军、余文波、陈红艳、徐健、秦迎华、常军、黄颖等。

专著虽然已有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就各专题而论,都保证了一定的质量,但如何把独立各篇合成浑然一体的专著则尚待进一步研究。于是,我在通阅了各篇专题论文之后,又结合自己这方面已有的知识,反复思考,拟定了一份比较详尽的写作提纲。在1997年秋冬之际,我的早期研究生徐建华副教授和他的妻子唐承秀女士,毅然请缨,并以半年为期,完成初稿。建华复邀其弟子柳家英女士相助。在整编各稿过程中又情邀历史系正在研究这段历史的研究生李庆刚执笔补撰了“解放战争时期图书事业”这一章。1998年春,在徐建华副教授的参加和组织下,《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的初稿终于如期完成,并送我统稿。

我为让这部由三代师弟苦心经营十多年的书稿早日摆脱待字闺中的命运,毅然搁置手边的一切工作,专心致志地审读、增补、删订,并在审读的基础上写出概括全书主旨的“绪论”,作为全书的第一章。然后,又将全稿退交家英,请其再增补部分内容,核对资料出处,删略重复歧出。并由建华再通读一遍,作为完整的初稿。我对这部完整的初稿再一次作了通读终审的工作,并写了前言、后记,选用了图片。至此,《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的定稿始告完成。

编写《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的目的,是为了对中国近代图书事业作一次总括性论述的试探。中国近代是一个曾发生过古今未有之奇变的重要历史时期,它的图书事业也同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有许多前所未有的特色需加以表述,尽管我们主观上比较详尽地作好逐年进行的规划,动用和投入了较多的人力,历时十年,数易其稿,但仍感到尚

有若干不尽如原来设想那样完美。这只有期待本书问世后,能获得学者和读者的更多关注,纠谬指正,给我们以帮助。我们差堪自慰的,是再一次实现了“三史合一”的宿愿,并与《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相衔接,形成一部比较连贯的中国图书事业通史。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鸦片战争时期的图书事业(1840—1860)	13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世界和中国的图书事业	13
一、资本主义世界的图书事业	13
二、中国的图书事业	19
第二节 现代印刷术的传入	22
一、现代印刷术的产生和发展	22
二、传教士在华创办的出版机构和现代印刷术的传入	24
第三节 传统书籍的刊刻及近代报刊的出现	31
一、传统书籍的刊刻	31
二、近代报刊的出现	34
第四节 初期的译书活动	37
一、传教士的译书	37
二、林则徐组织的译书活动	38
第五节 私人藏书和教会图书馆	41
一、私人藏书	41
二、教会办的藏书楼和图书馆	44
第六节 西方列强对中国图书事业的破坏	47
一、英军抢掠天一阁	47
二、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	48
第三章 太平天国的图书事业(1853—1864)	51

第一节 太平天国图书的发现与搜集	51
第二节 太平天国的图书事业	54
一、太平天国图书机构	55
二、太平天国印书制度	61
三、太平天国印书内容的一般特征及散布利用情况	66
第三节 太平天国地区公私藏书的损失	69
第四章 洋务运动时期的图书事业(1860—1890)	72
第一节 图书的搜集与典藏	73
一、官府藏书	74
二、书院藏书	75
三、私人藏书	78
第二节 图书目录的编纂与分类方法	96
第三节 翻译西书活动	101
一、译书机构	102
二、译者及译著	110
三、译书的作用	118
第四节 现代印刷技术的新发展和书籍装帧的变化	124
一、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	124
二、书籍装帧的变化	132
第五章 戊戌变法时期的图书事业(1890—1900)	134
第一节 图书的出版	134
一、资产阶级改良派著译的广泛问世	134
二、报刊类型的多样化	138
三、主要出版机构	143
第二节 图书的典藏	149
一、官府藏书楼	149
二、学院、学堂藏书楼	151
三、教会藏书楼	153

四、学会藏书楼·····	154
第三节 目录著作的编纂·····	157
一、改良派的目录学著作·····	157
二、国学举要目录·····	163
第六章 辛亥革命以前十年的图书事业(1901—1911)·····	168
第一节 书籍制度的演变·····	168
一、书籍制度的变化·····	168
二、外国图书的翻印·····	170
三、革命书籍与新型教科书的出版·····	173
四、四大文献的发现·····	178
第二节 近代期刊发展的第二个高潮·····	187
一、初期报刊兴起的原因·····	187
二、初期的各类报刊·····	190
三、初期报刊的特征·····	197
第三节 图书的社会功能与清政府对图书的摧残·····	201
一、图书对社会的作用·····	201
二、清政府对书刊的摧残·····	204
第四节 近代图书事业的兴起·····	208
一、革命派的读书活动·····	212
二、《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的颁布·····	213
三、近代公共图书馆的产生·····	214
四、近代图书馆学研究的萌芽·····	219
五、杜威十进分类法及其影响·····	221
第七章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图书事业(1912—1926)·····	225
第一节 出版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225
一、主要出版机构·····	226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出版工作·····	232
三、编辑、出版、印刷、发行融为一体·····	236
四、出版物品种与内容多样化·····	237

五、外资的出版印刷机构·····	239
六、西方出版印刷技术的改进·····	240
七、大力推广新式书籍制度·····	242
八、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出版事业的特点·····	245
九、关于版权纠纷·····	250
第二节 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兴起与发展·····	250
一、有关图书馆事业法令、法规的制定·····	253
二、各种类型的图书馆·····	255
三、“新图书馆运动”及其历史作用·····	263
四、图书馆学研究教育·····	264
第三节 传统私藏事业的终结·····	273
一、主要藏书家与藏书楼·····	274
二、对私人藏书的评价·····	280
第四节 丛书编纂与刊印·····	284
一、私人丛书的编纂·····	284
二、《四部丛刊》及其价值·····	286
三、关于“整理国故”运动·····	289
第五节 北洋军阀对图书事业的摧残·····	290
一、有碍图书事业发展的法规·····	290
二、对被禁书刊的分析·····	291
第八章 十年内战时期的图书事业(1927—1936)·····	294
第一节 国民党统治区的图书事业·····	294
一、图书出版概况·····	294
二、各类型图书馆·····	302
三、进步图书馆的活动·····	312
四、有关图书馆的法令·····	314
五、图书馆学研究教育·····	317
第二节 苏区的图书事业·····	326
一、图书出版概况·····	326

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329
第九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图书事业(1937—1945) ·····	336
第一节 国民党统治区的图书事业 ·····	336
一、图书出版概况·····	336
二、各类型图书馆·····	343
三、有关图书馆的法令·····	350
四、图书馆学教育与研究·····	352
五、图书馆协会及国际关系·····	356
第二节 沦陷区的图书事业·····	357
一、图书出版概况·····	357
二、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图书事业的破坏与掠夺·····	364
三、伪满图书馆的建立与伪满图书馆协会及其刊物·····	369
第三节 抗日根据地的图书事业 ·····	373
一、图书出版概况·····	373
二、各类型图书馆·····	379
三、图书馆协会的诞生·····	386
第十章 解放战争时期的图书事业(1946—1949) ·····	388
第一节 图书出版概况 ·····	388
第二节 各类型图书馆的抢救与保护活动·····	395
一、国家和公共图书馆·····	396
二、大学图书馆·····	399
第三节 国民党政府撤退时对图书的掠夺·····	404
第四节 解放区的图书与图书馆事业 ·····	407
后 记 ·····	415

第一章 绪 论

中国近代图书事业是中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延续,它虽在典藏、整理、编目、流通和编纂等方面仍有不少因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而延缓自身的发展与变化,但更重要的是它随着历史进程的巨变,无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各种冲击,终于在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出现不同于古代图书事业而独具的若干特色。

一、历史的新时期

当中国历史进入近代,由于政治历史事件的不断出现和西方势力的不断影响,社会的变化自然从部分而扩及各方。当广大知识分子日益频繁地接受西方文化并谋与本土文化结合的时候,图书事业也被人们置于视野之中,如先进人物林则徐、魏源等努力介绍西方,为近代图书事业注入新的内容;有的改良主义者(如郑观应),则提出了改革藏书体制的见解;大批维新派人物组织学会、读书会等等,以充分发挥图书宣传、启蒙的社会功能;更有一批知识分子承担了移植西方文化的角色,大量翻译西方著作,使图书的种别与数量大大增加。与此同时,外国传教士还借传播西方文化和进行译书活动的同时,也把西方图书馆学理论和操作技术东传过来,如杜威的图书分类法逐步取代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这些都显示东西方图书文化在日趋融合,而

最显著的标志是京师图书馆与浙江绍兴古越藏书楼的建立和向社会开放,使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从此由以藏为主走向藏用结合并开始进入以用为主的阶段。这是近代图书事业进入历史新时期最明显的标识。

辛亥革命的爆发,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受到冲击,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新思想的传播和各种思潮的纷纷兴起,又给中国近代图书事业注入了新的血液,赋予它以新的使命,使其成为新事物滋生的沃土。前所未有的具有革命内涵的新型图书馆亦破土而出,中国近代的图书事业被引上一条服务社会和民众的正确发展道路。然而,就在近代图书事业正在顺利前进的途中,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陷我国于兵火之中,生灵涂炭,百业毁灭,中国的近代图书事业承受了空前破坏的厄运,馆舍残败,藏书焚掠,人员散失,其损失之巨难以估计。抗战胜利后,又继之以蒋介石政府发动内战,连年兵火,中国近代的图书事业不能不陷于苟延残喘的境地。它预示着自1840—1949年的历史时期结束,另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将来临。

《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就是要将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传统和西方文化的影响、破土而出的新生气息和无端肆虐的血与火,描绘成一幅引人深思、发人猛醒的历史图卷。它不仅存历史的真实,也对未来提供从一个特定角度论述的借鉴。

二、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的分阶段问题

凡史的叙述,必然先要考虑分期和划阶段问题。近代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但史学界仍有下限究竟止于1919年,还是

1949 年的不同意见,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之所以下限定在 1949 年,是基于这 109 年的社会性质未变。如此分期可以比较完整地看到它所经历的奋进、求索和苦难的全过程。

在一个历史时期中还可以划分为若干阶段。中国近代图书事业的发展、变化以及所受到的残害和阻碍都与重大历史事件有着密切联系,所以,《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也就选择重大历史事件和活动作为划阶段的界标。它除了绪论外,大致按事件结合时间划分为九章,即: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前、北洋军阀统治、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九章。这九章不仅体现了重大的政治变化,图书事业的变化也与之大体符合。其中两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是在同一时间段内;但是,由于清政府与太平天国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政治势力,它们对图书事业的政策、措施和影响都有各自的特色,所以分别给以专章的论述。在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时期,由于实际上存在三个战场,所以我们就分为国统区、苏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方面加以论述,以求对该时期有一全面、完整的叙述。

三、从藏书楼走向近代图书馆

藏书楼是中国藏书建设中私藏的主要场所,从汉代以来,藏书楼就已开始出现,历代相沿不绝,而明清最称鼎盛。进入近代,藏书楼的藏书体制仍在继承发展:前期如曾钊、马国翰、朱绪曾、蒋光煦等人都是拥有数万以至十数万册藏书和较多珍善本书的藏书楼主人,而最为人所注目者则为晚清四大藏书家,即:“皕宋楼”的陆心源,“八千卷楼”的丁申、丁丙兄弟,“海源阁”的杨以增、杨绍和父子以及“铁琴铜剑楼”的瞿绍基、

瞿镛父子。它们一依传统的藏书体制,对搜求和保护图书起到了重要作用。包括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的“嘉业堂”刘氏,它们都在不停地起着保护图书文化的作用。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外国教会在向中国输入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利用藏书楼的名义建立新的藏书体制进行图书的搜求和典藏,并以西方的图书馆知识影响中国,加速近代图书馆的尽早出现。与此同时,有些接受和吸收西方思想的维新人士也曾提出改革图书馆的意见,如郑观应在其所撰《藏书》一文中,首先揭示历来以藏为主的弊病说:“海内藏书之家,指不胜数。然子孙未必能读,亲友无由借观,或鼠啮蠹蚀,厄于水火,则私而不公也。”继而介绍西方藏书及借阅情况,并提出公开图书将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取得“我中国四万万华民必有出于九州万国之上者”的成效,反映了知识界对近代图书馆的渴望。光绪二十四年(1898),京师大学堂成立,其章程第五、七、八各章均有专节论及图书馆的建立、管理和借阅等事,并作了具体的规定,为中国近代高等院校建立图书馆的正式创始。这些新生事物尚难立即为一般人所接受,如京师大学堂建馆之始,甚至无人敢入内阅览。延至二十世纪初,浙江绍兴名流徐树兰父子捐资建古越藏书楼,“以家藏经史大部及一切有用之书,悉数捐入,延聘通人,分门排比;所有近来译本新书及图书标本,雅训报章,亦复购备,……一备阖郡人士之观摩,以为府县学堂之辅翼”。它开始了民间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蜕变。古越藏书楼虽仍具有藏书楼的意味,而实际上则已订立章程,公开借阅,具备了近代图书馆的雏型。民国以后,公私图书馆逐渐兴起,而传统的藏书楼虽在私家仍有一些袭用旧名者,但总趋势是在日见衰退。近代图书馆体制则日益发展完备,完成了从藏书楼过渡到近代图书馆的全过程,成为中国近代图书事业

中最明显的标志。

四、图书范围的扩大

历代公私藏书多以四部及丛书为主,间有其他,亦为数不多。近代以来,学术门类日广,著作者的视野拓宽,外来文化的不断输入,致使图书的种别与数量大为增加,主要是译书和有维新与革命思想内容的书刊。译书从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的林则徐开眼看世界。他借助于政治条件的便利,广泛地搜罗翻译人才,大量翻译西书西报;友人魏源主要根据这些材料相继纂成《四洲志》和《海国图志》,开启了研究西方、介绍西方的风气,许多有关西方史地内容的图书相继出现了,如《瀛环志略》、《中西纪事》、《通商始末记》等即是。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时期,译书活动达到高潮,从单纯介绍西方史地知识外,政治、科技等方面尤为集中,如洋务运动的三四十年间,在中外翻译家互补短长的情况下译书近千种。在戊戌变法前夕,维新派人物更推波助澜地把译书活动推进一步,提出了新的译书应“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为原则,但实际上仍以西书为主,如王韬译有《格致西学提要》、《普法战纪》等;英国浸礼教派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五六年间共出版了《泰西新史揽要》等译著 30 余种,特别是著名翻译家严复在 1898 年以来的十余年间先后译有《天演论》、《原富》、《穆勒名学》等八大名著。林纾也翻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据《译书经眼录》的统计,二十世纪的前五年出版的主要译著共 25 类 533 种,约为前 60 年译书量的总和,其中译自日本的虽起步较晚,但后来居上,所译图书有 321 种,占全部译书量的 60% 强。大量译书的出版为旧有的典藏增添了新的内容。

另一类具有维新与革命内容的图书也风起云涌地出现,最先是太平天国图书,太平军自在南京建立政权以后,就注重出版图书工作,设立刻印图书的专门机构,统一管理,实行“旨准颁行诏书书目”制度,最多列有 29 部。这些革命图书在太平天国失败后,虽多遭禁毁,但尚有流传海外,后经学者抄回者。六十年代以后,维新分子大量著书立说,鼓吹改良,冯桂芬、郑观应、王韬、马建忠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著有若干具有维新变法内容的图书行世。二十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展开,革命书刊盛行一时。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白浪滔天的《三十三年落花梦》等等以及明末清初一些反清思想家著作的出版,为图书的典藏又增添了新内容。尤其是报刊的大量编印,除改良与维新两派进行对立宣传的《民报》和《新民丛报》外,尚有其他革命派所发行的报刊更如雨后春笋似地破土而出,如《中国日报》、《开智录》、《浙江潮》、《云南》、《晋乘》等等。从此,书、刊成为典藏中相沿至今的两大类别。

第三类是教科书的编印出版。1897 年南洋公学首先编出的《蒙学课本》是中国近代自编教科书的始创之作,但不甚理想。以后,无锡、上海等地相继自编教科书,但或不合使用,或被迫停止流通而未得发展。1907 年清政府学部编辑出版了《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等数种,因内容守旧,不为社会所欢迎。直至商务印书馆出版《最新教科书》,才使中国的教科书形式趋于完备。商务印书馆在 1904—1906 年间曾在张元济、高梦旦倡议和主持下按新学制编印了《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和《最新小学国文教科书》等,风行一时。不久,高梦旦从日本考察归来后,在张元济的支持下,并邀请日人参加,大力开展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先后编出高初小需用的国文、修身、珠算、地理、历史、农业、商业等教